

从因果效应到因果机制：实验政治学的中国路径

孟天广

(清华大学 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 北京 100084)

摘 要：实验政治学在探究政治现象之因果关系上有独到价值，其发展反映了政治科学对因果关系探究和经验理论创新的优先价值导向。伴随着实验方法的发展和应用场景的丰富，实验政治学开发出诸如实验室实验、现场实验、调查实验、自然实验和政策实验等丰富的工具箱，并被广泛应用于政治心理学、政治行为、选举和议会政治、政治制度、政治传播、集体行动与合作、国际关系等多个领域。回顾实验政治学的演进及其影响，讨论实验政治学在识别因果效应和挖掘因果机制中的独特作用，结合实验政治学在中国的发展及应用，最终提炼出实验政治学在中国的发展，应致力于探究中国政治过程、行为、制度等现象中所蕴含之“因果性”的中国路径。

关键词：实验政治学；因果效应；因果机制；研究方法

中图分类号：D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17)05-0030-09

DOI:10.16501/j.cnki.50-1019/d.2017.05.005

1 问题的提出

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前沿发展正在经历探究因果关系的变革。这一变革的推进源于政治学理论与研究方法在过去几十年的持续积累，尤其是政治学在方法论、方法技术和经验理论三个层次的持续互动。尽管政治学界对政治科学研究有着不同理解，基欧汉和维巴在经典著作《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设计》中尝试着对“科学研究”提出四项基本要求：以推论为研究目的；采用公开的研究程序；结论是不确定的；研究内容是关于方法的^[1]。这为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发展、辩论及扩散奠定了方法论依据，并在方法论层面强调任何社会科学的目标都应该是探索描述性或因果性推论，即强调知识积累的“因果性”(Causality)^①。对整个社会科学而言，探究因果关系并非仅仅为了满足好奇心以理解社会现象或行为，更重要的是通过科学研究促进人类社会的知识积累，为改善或干预人类社会提供知识库。

除了政治学在方法论层次对因果关系的追求，近年来政治学对因果性政治理论的追求极大地受益于对经验政治理论的迫切需求。伴随着全球化和网络化时代政治现象和政治过程的日益复杂化和交互化，经典规范政治理论在解释力和对政治实践的指导能力上都表现出诸多局限，诸如全球治理、民主化与民主赤字、福利扩张与衰退、国家能力与治理、数字民主与网络暴政、恐怖主义与文化冲突等现实政治问题的解决迫切需要经验政治理论的供给。经验政治理论的核心特征即是经由对经验政治现象的定性或定量的“科学化”研究，探求政治现象或过程的因果关系，重视中观和微观层面政治现象背后的特定概念、变量或因素间的因果性^[1-2]。中微观层面的特定因果关系将理论发展与政治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在理论与实践的持续对话中共同发展。传统社会科学中大多数研究属于观察研究而非实验研究，这为社会科

收稿日期：2017-07-1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治理能力视域下政府质量评估体系及提升路径研究”(15CZZ036)，项目负责人：孟天广。

作者简介：孟天广(1983—)，男，博士，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仲英青年学者，数据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① 因果性(Causality)也称为“因果关系”，本文交替性使用因果性或因果关系。对因果关系的理解可参见 RAGIN C. C. Redesigning Social Inquiry[M].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94; GERRING J. The Mechanismic Worldview: Thinking Inside the Box[J].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008(1): 161-179.

学领域识别和评估因果关系带来巨大挑战。近年来,一系列包括实验方法、准实验设计、统计方法、定性比较分析等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发展及成熟,为探求因果关系提供了丰富的工具箱,并发展出一系列在方法论层面判定因果效应、检验因果机制的研究方法。

社会科学实验研究在20世纪20年代首次亮相,自此社会科学家开始采用随机分配原则并分配被试对象为控制组和干预组。最早的政治学实验在20世纪40年代出现,美国政治学评论的第一篇实验论文在1956年出现^[3]。然而,实验研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被视为“异常”。利普哈特指出“该实验方法是最为接近理想的科学解释方法,但不幸的是它很少在政治学中使用。”^[4]进入1990年代,政治学领域的实验研究迅速崛起并向本国政治、比较政治、国际关系等各个领域扩散^[5]。

近十多年来,借鉴自然科学研究的实验范式,政治科学日益重视将实验方法应用于经验政治理论构建和检验。由于实验方法具备随机化配置干预、可重复性、标准化操作、可控条件、时序性等类似科学研究特征,近年来被广泛应用于政治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成为探究因果关系的黄金标准^[6]。随着实验方法的发展和应用场景的丰富,实验政治学(Experimental Political Science)开发出诸如实验室实验、现场实验、调查实验和自然(政策)实验等丰富的工具箱,并被广泛应用于诸如政治心理学、政治行为、选举和议会政治、政治制度、政治传播、集体行动与合作、国际关系等多个亚领域。本文首先回顾实验政治学的演进及其学术影响,其次讨论实验政治学在方法论、方法技术和理论创新三个方面的价值,尤其关注其在识别因果效应和挖掘因果机制中的独特作用,再次结合实验政治学在中国的发展及应用,最终从本土化角度尝试实验政治学的中国路径。

2 实验政治学的兴起与发展

政治学领域的实验研究起源于20世纪40—50年代的竞选动员研究。实验政治学的早期代表作探讨不同选举动员模式对投票行为的影响。其后实验被逐步引入国际冲突解决、政治传播等领域。进入1990年代,伴随着政治学对因果关系的重视,实验政治学如雨后春笋般在整个学科扩散,近来逐渐成为与定量研究、定性研究并列的主要研究方法之一。实验方法在探究因果关系领域成为备受认可的优先选择。

2.1 实验政治学的方法论功能

按照不同的划分标准,实验方法可以有不同的分类,首先从方法论功能角度来探究实验政治学的类型。实验政治学在方法论上可以承担不同功能,譬如罗斯认为实验研究承担三类功能——寻找事实、理论对话、参与政策制定,三种功能有效地将实验学者、理论学者和政策决策者结合起来^[7]。寻找事实实验之目标是将原因与一些可观测的规则区分后,通过区分实验操作的具体方式来发现特定因果关系。理论对话实验旨在检验已设定的先验理论,或者提出替代性理论。参与政策制定(现场)实验利用自然发生的政治情景作为随机分配来进行因果推论,从而为政策制定者或评估者提供知识。

从研究过程的角度看,实验研究还承担概念构建和测量、因果效应识别和因果机制检验等功能。本文第三部分将深入讨论实验研究在后两个功能上的表现,此处只讨论实验研究在概念构建和测量中的作用。有效的因果推论首先依赖于既具信度又具效度的概念构建和测量,然而,社会科学研究总是面临着一些影响概念测量的因素,譬如社会意愿偏差^[8]、跨文化(群体)概念可比性^[9]等。政治学者通过列举实验、背书实验和情景锚定实验等测量实验来解决上述挑战。社会意愿偏差是社会调查中经常遇到的难题。社会调查中通常由受访者自报信息,而人们往往倾向于否认社会不希望的行为而倾向于承认社会所希望的行为^[8],这使得在涉及到有关社会规范、政治正确等问题时,受访者倾向于隐藏对自己不利的行为,使得调查结果系统性偏向那些“正确的”或者社会所提倡的行为,与实际情况发生偏离,而此类测量误差会降低、平滑或者中和变量之间的关系。为此,研究者提出随机应答实验^[10]、列举实验^[11]、背书实验等方法来削减社会意愿偏差的影响。此外,面对民主、信任、公正等政治学核心概念存在跨文化(群体)不可比的挑战,加里·金(Gary King)等人提出情景锚定法为抽象政治学概念在不同文化(群体)中实

现具有可比性的测量提供了方法论依据^[9]。

2.2 实验政治学的研究设计

从实验形式来看,实验政治学包括实验室实验、调查实验、现场实验和自然实验等。这些类型的实验因参与者受到干预的场景和过程有所不同,干预的程度和方式、受控制的程度也差异甚大。通常而言,越是开放的实验场景意味着越少的控制,但隐含着更优的外在效度。实验室实验源于心理学实验的启发^[12]。然而,社会科学家长期以来对实验室实验存有偏见,因为实验室作为实验场景过于做作,实验对象对任何有意义的目标人群都没有代表性。此外,许多政治学家把假设实验——这通常需要欺骗研究对象——看作一个内在不道德的方法。1980年代以来,政治心理学研究促使实验室实验逐渐兴盛,大多侧重于政治行为、舆论和大众传播领域,部分也涉及国际关系与公共选择等领域。实验室实验的重大挑战在于缺乏合适的实验室设施、招募实验对象、高昂的实验成本等。

通过在有代表性的样本中进行调查实验,即将设计精致的实验内嵌于大规模社会调查,可以克服实验室实验中存在的问题。调查实验采用抽样调查的方法来生产代表特定理论的目标人群作为实验对象的集合,参与者不要求在实验室参加实验,这使得调查实验更为实用。严格来说,基于总体的实验是在随机样本中随机分配干预,从而实现建立在因果推论基础上的一种实验方法。其优点是理论可以在代表总体的样本中进行检验。调查实验尽管没有实验室那样的“方便样本”,但也存在外部有效性、有限实验控制等问题。比如,许多调查实验在参与实验之前已将被试者暴露在特定干预情景中,这会导致复杂的因果推论^[13]。

现场实验被看作是一种发生在现实场景中的实验方法,它克服了其他实验的人为操作性。但是,现场实验由于较难控制而导致可以向被试者施加实验干预的手段变得更少。现场试验利用自然产生的政治情景优势,同时利用随机分配干预的因果推论优势,加之其“现实”基础,使得现场实验对决策者尤为重要。政治学领域的现场实验最早在1920年代由哈罗德·F.戈斯内尔(Harold F. Gosnell)发明,他在1924年的总统选举和1925年的芝加哥市长选举中调查了“走出投票”邮件的效应^[14]。1950年代,塞缪尔·埃尔德·维尔(Samuel Eldersveld)进行了一项随机现场实验来衡量邮件、电话等动员策略对安阿伯市的投票率的影响^[3]。各类实验设计均存在优势和劣势,研究者要根据研究目标和实验可行性来选择。

2.3 实验政治学的研究领域

实验政治学的早期研究主要关注政治心理学议题。受心理学的影响,1980年代一批学者从社会认知借鉴了大量心理学实验并定义了政治心理学的不同领域。由于传统定量方法受到如内生性、自我选择和遗漏变量偏差等问题的局限,很多政治学者把实验看作一种识别因果关系的方法进行探索。政治传播和竞选动员是实验政治学的核心主题。唐纳德·R.金德(Donald R. Kinder)等开展了一系列评估新闻媒体影响公民意见的实验,这些实验表明观看网络新闻对观众的政治意见有重大影响^[8]。现场实验还被应用于党派对政治态度的影响,艾伦·格伯(Alan Gerber)等在地方选举前随机给受访者订阅华盛顿邮报,然后考察媒体倾向对投票行为的影响,发现订阅报纸增加选民参与,也使选民偏好向民主党候选人转移^[15]。

实验研究还被应用于政治行为、决策和政治态度研究。乔治·夸特罗(George Quattrone)等假设决策者在面对规模相当的收益和损失时会设置均等且方向相反的权重,而替代性假设使被试者对亏损比收益更敏感^[16]。采取被试间设计,他们对斯坦福和伯克利的本科生开展了一系列实验,发现受试者会出现“偏好逆转”,并通过控制信息环境发现人们对经济计划的偏好将不依赖于项目设计。保罗·斯奈德曼(Pawl Sniderman)等进行了不分种族实验和色彩双盲实验,两个实验都表明,对帮助黑人的政策的支持度显著程度更高。该结果说明在政治上不止一个获胜的联盟可以在相同的平衡条件下存在^[17]。伊丽莎白·帕拉克(Elizabeth Paluck)在种族屠杀后的卢旺达进行了现场实验。他们随机选择一些社区,使其可以接受批评威权统治的电台节目,结果显示,收听节目导致公众更愿意表达异议^[18]。实验方法在政治制度、政策评估和合法性等领域也有应用。本杰明·奥肯(Benjamin Olken)比较了可替代机构在印尼公共

物品选择方面的绩效,他认为,虽然更具参与性的机构不改变批准项目的设定,但参与者对决策制订过程更为满意^[19]。关于政治参与的社会压力影响,格伯等调查了可以施加不同程度的社会压力的替代邮件的影响。他们发现,选举前邮寄罗列收件人自己的投票记录和罗列收件人和他们的邻居的投票记录会造成投票率急剧增加^[20]。

3 从因果效应到因果机制: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演进

在方法论层面,对致力于探求因果关系的政治科学而言,随机实验是方法论上的理想选择。实验政治学在探究因果关系方面有独到价值,其发展趋势反映了政治科学对因果关系探究和经验理论创新的优先价值导向。人类对因果关系的追求可以追溯到前苏格拉底时代,伴随着科学研究方法在文艺复兴之后的兴起,因果性成为科学研究的终极目标。尽管人们在不同意义上使用因果、原因、结果等概念,但科学研究普遍相信“凡事必有因”,譬如“苹果落地是因为重力”“财富不平等会影响政治运作”“政治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原因之一”等。因果性本质上是原因和结果的关系模式。亚里士多德首次系统讨论了因果性,他区分了四种原因:结果发生的物质原因、结果出现的正式、本质决定的原因、形成效果的有效原因(力量)、最终原因或目的^[21]。在方法论层次上,学术界关于因果关系已经形成差异化理解。诺埃尔·史密斯(Nowell-Smith)将因果性概括为三类:人类代理,即人类通过采取行动产生一个预先设定的结果;自然原因,即自然事件产生特定或预先设定的结果;原因即为解释。他关于因果性的第三种界定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巨大空间,超越了对因果关系的决定主义认知,为备择假设或竞争性解释的存在提供了方法论基础^[22],而实验被认为是帮助科学家经验地构建并检验因果关系的强有力方法论。实验方法在探究因果关系的效应(方向)与机制(过程)两个维度均具有独特优势,这本质上源于实验研究的功能是对因果命题的审慎检验^[23],即研究者通过设计并操作实验来识别原因(或干预)是否影响结果,影响效应的大小,以及原因如何影响结果等。实验政治学的目标不在于回答描述性或诠释性问题,其价值在于通过透明过程、标准程序、随机分配干预等机制回答因果性问题。

因果性的传统关注是识别或判定因果效应,后者被称为因果性的首个要素。因果效应,反映因果性的存在与否以及变量间关系的方向。社会科学中大多数研究属于观察研究,观察研究是一种无法使用控制实验和随机分配干预(原因)以阐明因果关系的实证研究方法^[24]。观察研究的上述局限导致在识别因果效应时,原因(或干预)并非在研究对象间随机分配,研究样本不可避免地存在“选择偏误”^[25],这危害着因果推论的内在效度。观察研究传统上利用统计控制来克服因果推论的困境,然而,实践证明上述方法只能部分削减危害因果推论的要素。相反,基于反事实框架(Neyman-Rubin Counterfactual Framework of Causality),实验研究评估因果效应的基本思想是比较方法,考虑到研究者不能同时在干预状况和控制状态观测到研究对象,那么要评估某原因(干预)对结果的效应,研究者应该通过随机分配干预来创建一个与干预组尽可能类似的控制(反事实)组,此时比较干预组和控制组在结果变量上的平均差异就可以发现因果效应^[26-27]。实验方法由于具备随机化配置干预、可重复性、标准化操作、可控条件等类科学研究特征,近年来被广泛视为探究因果关系的黄金标准。

探究因果性并不能仅仅满足于识别因果效应,因果关系之本质在于为因果效应提供因果(机制/过程)性解释。研究者关心特定原因(干预)如何影响结果的变化,即因果效应背后的特定因果性解释,也被称为因果机制^[28-30]。因果机制回答了因果关系中“如何”的问题,超越了原因与结果间有无关系的定性判断,为解释社会现象提供了关于原因影响结果的具体化因果链条或因果推理的可检验评估^[31-32]。根据约翰·吉林(John Gerring)的总结^[28],学术界已经形成了对因果机制的九种不同理解:(1)形成因果效应的路径或过程;(2)不可观测的原因要素;(3)容易观测的原因要素;(4)情景依赖性解释;(5)全局性解释;(6)概率性因果联系的解释;(7)准规律性现象的解释;(8)特定定性分析技术;(9)因果现象的微观机制。基于对因果机制的多元化乃至冲突性理解,学术界对因果机制的追求依赖于三个互相交织着的方法论主张:首先是审慎地构建连接原因与结果的因果路径(机制);其次是经验地检验这些竞争性

因果路径(机制)的期望;再次在微观层面发现宏观理论的具体作用机制^[33]。诸如定量、定性和实验等研究方法传统上被认为有能力发现因果效应,但无力打开因果性的“黑箱”提出并检验特定因果机制。简言之,传统研究方法只能发现平均因果(干预)效应,但不能解释这些效应由何而来。近年来,伴随着实验方法工具箱的丰富化,实验方法被认为是打开因果机制“黑箱”的有力工具^[29,34]。

4 中国的实验政治学发展及应用

近年来,中国政治学领域对因果性知识、经验性政治理论的需求日益迫切,加之中国实验式治理实践的丰富化和理论化,聚焦于中国政治和治理研究的一批国内外学者逐渐广泛地采取实验方法对中国治理模式、国家社会关系、协商民主和网络政治进行原创性研究,并日益成为理解国家治理的重要研究方法。

4.1 概念测量实验与政治行为实验

众所周知,社会意愿偏差对概念测量的工具信度和效度均有影响,列举实验和背书实验被应用于中国语境以削减测量误差。列举实验在保护个人隐私的情境下要求受访者报告条目总数而非具体条目来降低受访过程中其所感受到的社会意愿压力,近年来已被应用于激进政治行为、政治敏感问题、腐败行为等概念的测量。孟天广和季程远还利用列举实验法测量了激进政治行为,发现传统测量方法明显低估了激进政治行为的水平,从而导致对激进政治行为之原因的有偏分析,提出互联网介入塑造政治参与的假说^[35]。互联网介入指人们利用互联网的方式和程度,集体性介入为网民搭建的组织与动员网络、信息交流与分享平台,直接激发网络政治参与,而个体性介入则通过隔离网民和网络利用商业化弱化了网络政治参与。刘小青采用虚拟情景锚定法测量了政治效能感,并探讨了该方法的优势和不足^[36]。

4.2 政治制度研究

伴随着中国的政治演进,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也逐步采取实验方法研究政府回应性、协商民主、人大制度等。陈济冬等通过在2103个中国县级政府开展在线现场实验,研究了在当代中国政治制度下刺激官员回应公民诉求的影响因素^[37]。调查发现,大约三分之一的县政府在线回应了公民表达的诉求,集体行动的威胁和向上级政府上访的威胁引起县级政府更为积极、公开的回应。自上而下的监督机制以及自下而上的社会压力是政府回应公民诉求的两个可能动力。孟天广等进一步发现地方政府对公民诉求的回应存在渠道差异,并且依赖于地方性国家-社会关系^[38]。尽管公民可以通过正式和非正式渠道表达意见,但地方政府对正式途径反映的公民意见保持持续回应,而对非正式途径表达的意見的回应依赖于和谐的地方性国家-社会关系。何包钢从政策实验的角度分析了浙江温岭的协商民主实验,认为中国的农村民主已经从村庄选举演变为村庄协商,并基于实验发现呈现了村庄协商民主的前景^[39]。

4.3 政策(治)实验与自然实验

早期有关中国政治的实验研究偏好政策实验的思路,将中国政府制度改革或政策创新作为实验干预,来分析外生的政策实验的政治影响。如詹姆斯·德勒思(James Derleth)等分析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区的选举和社会福利实验,认为这一实验尚未对中国政体产生显著影响^[40]。托马斯·伯诺尔(Thomas Bernauer)等在全球治理背景下,以全球气候谈判为例,利用调查实验探讨了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社会组织参与对谈判过程和结果的影响,以及公众对社会组织参与国际谈判的评价^[41]。北京市民认可社会组织参与全球气候谈判的正面作用,但是民众更倾向代表团由政府组织组成,社会组织介入谈判会提高谈判的透明度和代表性。因此,政府应积极引导民众了解国际治理,建立民众与政府、社会组织的互信关系,为中国参与国际事务奠定组织和制度基础。

5 实验政治学的中国路径:范式、议题与方法

实验政治学在中国的发展应致力于探究中国政治过程、行为、制度等现象中所蕴含的“因果性”,有效地识别或判定政治学概念、变量或因素之间的“因果效应”,科学地挖掘“因果性”背后促使概念、变量或因素发挥作用的“因果机制”,本文从以下五个方面探讨实验政治学的中国路径。

5.1 建立实验政治学的研究范式

实验方法也存在若干局限性迫切需要得到解决。例如,实验室实验由于数据产生过程在可控的实验室进行,被批评缺乏现实的社会情景,尽管保障了因果推论的内部效度,但却缺乏外部效度;调查实验可以通过随机抽样保证外部有效性,然而实验过程中对实验条件的控制有所不足;田野试验尽管克服了其他类型实验的人为性,但该方法对实验干预的控制最少,同时受试者偏差也难以避免。此外,若干实验由于涉及信息欺骗、潜在人体伤害等在学术伦理上被诟病。然而,近年来跨学科研究的兴起、实验设计的优化、实验方法的规范化正在逐步克服上述方法困难,并带动实验方法在社会科学领域的飞速发展,逐步促成实验社会科学的形成。中国实验政治学发展的首要任务是建立通用的方法范式,这涉及学术界对实验方法的目标、功能、标准化操作程序和评价标准的确定。

5.2 深入挖掘因果机制 构建政治学的微观机制

作为实验政治学的核心关切,实验研究对因果机制的挖掘可以通过以下路径实现:(1)精致的实验设计。研究者根据已有知识积累、数理或形式逻辑推理等提炼出若干解释性机制,并通过(机制变量)概念操作化、对时序的操作等方式观测已被定义的(因果)机制性变量,再基于采集的有关干预变量、机制性变量和结果变量等信息恰当地检验因果机制。(2)可控制的实验操作。研究者采取标准化的实验手段随机化地分配干预,并准确地采集机制性变量和结果变量,有效地应对危害实验因果推论之内部和外部效度的潜在威胁,如社会期望效应、刻板效应、安慰剂效应、跨群体可推广性等挑战。(3)实验的事后分析。传统上因果机制借助结构方程模型来估计,然而这种路径存在并非源于因果推论框架、难以扩展到非线性模型、无法对估计平均因果调节效应的前提假定——连续可忽略假定进行敏感性分析等困境,有学者提出因果调节分析在因果推论框架下构建并评估竞争性因果机制^[34]。此外,实验方法还被认为适用于构建宏观因果关系的微观机制^[42]。

5.3 推动政治学的跨学科研究

将实验方法引入政治学研究大力推动了政治学与生命科学、心理学、传播学和经济学等学科的跨学科研究。社会科学领域的实验方法源于自然科学,但不同学科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实验研究路径,作为“后发者”,实验政治学同时从多个学科借鉴其实验研究路径。这不仅促成了实验政治学的生态多样性,更有助于结合多个学科之理论和方法要素以推动学科发展。实验政治学方兴未艾,其推动的跨学科研究已经成果斐然:譬如部分学者借鉴生命科学实验方法,采取可控随机实验探讨神经、基因、生物特征对政治行为、政治意识形态的持久影响,从而形成神经政治学、基因政治学等^[43];政治学大量借鉴社会和认知心理学等研究路径,从心理、认知和群体等角度开展实验室实验和调查实验,挖掘政治行为者的情绪、认知、个性和认同等心理要素对个体和群体决策、政治行为、暴力和极端主义等独特影响;实验政治学也为从行为科学角度研究政治行为提供了新机遇,推动着行为实验与形式模型在政治学领域的推广。社会科学领域的实验方法具有共通性、标准化和可复制性。实验政治学要加强与心理学、经济学、生命科学等的交流与合作,开展跨学科研究。

5.4 大力发展现场实验、调查实验和政策(自然)实验

实验政治学在中国的发展要突出非实验室实验的重要性。现场实验、调查实验和政策(自然)实验等非实验室实验适用于理解复杂社会中的政治现象,不仅适用于从理论上提炼出有助于理解中国改革实践的中观和微观理论,更有助于从实践上推进国家治理的演进。近年来,非实验室实验的快速发展受益于政治学理论创新对中观和微观层次理论的迫切需求^[44],也源于世界各国治理制度与实践的多样性这一重大事实,而各类非实验室实验有助于学术界把握政治学宏观理论的中微观基础,推进对因果联系背后之因果机制(过程)的把握^[45]。同时,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改革实践赋予了实验研究独特应用场景和丰富机遇。大量研究表明中国近40年改革采取了渐进主义、实验主义改革路径^[46],大量改革实践采取地方试验、政策试点、竞争性试验、反复试验、政策评估再推广等模式展开,这为应用实验政治学生产和积累改革理论与知识提供了丰富的“试验田”。此外,实验工具和技术的开发为大力发展非实验室实验创

造了硬件条件。两项方法革新为调查实验和现场实验的普及创造了条件: (1) 计算机辅助的电话或电脑访问技术为在大样本条件下执行实验研究提供了技术储备,传统的二分实验设计仅允许检验单个干预的效应,而目前的技术允许同时检验多个干预的效应,随机化分配干预也变得更加便捷,且计算机自动存储多样化测量的结果变量以及丰富的并行数据; (2) 互联网的普及进一步扩大了基于人群的实验的可能性,互联网可以提供视觉和听觉刺激给随机分配的被试者,允许实验过程中出现在线交互,并具备动态采集和分析数据的能力。非实验室实验促使研究者在现实社会中或者以假设式情景,或者在自然(社会)环境中切入实验的方式来识别因果联系。

5.5 大数据方法与实验方法的结合

大数据方法的蓬勃发展为实验研究的拓展创造了新条件。将大数据方法与实验方法进行结合本质上反映了观察性和实验性研究融合的趋势,不仅充分利用了大数据方法具备全量数据、时效性强和数据类型多元的优势,更空前丰富了实验研究的工具箱。大数据方法为自然实验、现场实验和调查实验提供了良好的应用场景,二者的结合有两种典型路径。第一种路径是大数据方法发挥观察性研究的功能,通过海量数据的采集和挖掘,获得对研究对象之状态、特征或模式的描述性推论或相关关系的理解,进而设计实验研究检验变量间的因果联系或机制,从而加强我们对研究问题在广度和深度上的知识积累。譬如金等结合参与式观察和现场实验探讨了网络舆情监管的逻辑基础,两种方法交叉验证并得出一致结论,从而强化了理论主张的稳健性^[47]。第二种路径将大数据方法直接应用于实验设计,拓展了实验研究设计及操作化干预(原因)、随机化分配干预、控制威胁内部和外部效度之因素、测量和识别实验效应(结果)的工具箱。结合日益普及的互联网和廉价化的通讯设备,实验研究的随机化分配干预变得更加便捷,譬如在平板电脑、智能手机中安装实验软件(APP)较传统实验方法更有效地随机化分配干预;实验研究的干预施加(暴露)更具多样性,与传统实验相比,大数据方法可以通过文字、图像、视频、网络关系等非结构化信息向被试者施加干预,同时也可以采取多元方式测量实验结果,譬如记录被试者对特定问题的答案、文本(言论)、行为和音像资料等;大数据也推动了在线实验的兴起,即对海量网络用户开展大规模实验,既保障实验结果的外部效度,又保障实验场景的现实性,还可以观察干预的短期和长期效应。譬如 Bond 等在 2010 年美国国会大选时对 6 100 万 Facebook 用户实施了政治动员的随机控制实验,来比较线上竞选动员和面对面竞选动员对投票行为的影响^[48]。

总之,实验政治学是政治学新兴学科,实验政治学在探究因果关系方面有独到价值,其发展趋势正反映了政治科学对因果关系探究和经验理论创新的优先价值导向。实验方法在探究因果关系的效应(方向)与机制(过程)两个维度均具有独特优势,这本质上源于实验研究对因果命题的审慎检验,即研究者通过设计并操作实验来识别原因(或干预)是否影响结果,影响效应的大小以及原因如何影响结果等。实验政治学在中国的发展及应用不仅有助于推动政治科学方法论的普及和规范化,而且促进政治学经验理论的创新和积累,更重要的是为挖掘“实验主义”中国改革的独特政治实践提供有力工具。

参考文献:

- [1] KING G,KEOHANE R O,VERBA S.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Scientific Inference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M].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4.
- [2] RAGIN C C.Re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M].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94.
- [3] ELDERSVELD S J.Experimental Propaganda Techniques and Voting Behavior [J].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56 (1): 154-165.
- [4] LIJPHART A.Comparative Politics and the Comparative Method [J].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71(3): 682-693.
- [5] DRUCKMAN J N.et al.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Experimental Research in Political Science [J].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2006(4): 627-635.
- [6] DRUCKMAN J N. et al. eds.Cambridge Handbook of Experimental Political Science [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
- [7] ROTH A E.Introduction to Experimental Economics [G].In The Handbook of Experimental Economics,ed.KAGEL J H.and

- ROTH A E.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5.
- [8] ZERBE W.J. & PAULHUS D L.Socially Desirable Responding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 Reconception[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87(2) : 250-264.
- [9] KING G ,WAND J.Comparing Incomparable Survey Responses: New Tools for Anchoring Vignettes [J].Political Analysis , 2007(1) : 46-66.
- [10] WARNER S L.Randomized Response: A Survey Technique for Eliminating Evasive Answer Bias[J].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1965(309) : 63-69.
- [11] KUKLINSKI J H. ,COBB M D. & GILENS M.Racial Attitudes and The “New South” [J].The Journal of Politics ,1997(2) : 323-349.
- [12] DIPBOYE R L ,FLANAGAN M F.Research Settings in Industrial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Are Findings in the Field More Generalizable Than in the Laboratory? [J].American Psychologist ,1979(2) : 141-150.
- [13] GAINES B J ,KUKLINSKI J H ,QUIRK P J.The Logic of the Survey Experiment Reexamined[J].Political Analysis ,2007 (1) : 1-20.
- [14] GOSNELL H F.An Experiment in the Stimulation of Voting[J].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26(4) : 869-874.
- [15] GERBER A S.et al.Does the Media Matter? A Field Experiment Measuring the Effect of Newspapers on Voting Behavior and Political Opinions[J].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 , 2009(1) : 35-52.
- [16] QUATTRONE G A. and TVERSKY A.Contrasting Ra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Analyses of Political Choice[J].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 1988(3) : 719-736.
- [17] SNIDERMAN P M. and CARMINES E G.Reaching Beyond Race[M].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 [18] PALUCK E L. ,GREEN D P.Deference ,Dissent and Dispute Resolution: An Experimental Intervention using Mass Media to Change Norms and Behavior in Rwanda[J].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09(4) : 622-44.
- [19] OLKEN B.Direct Democracy and Local Public Goods: Evidence from a Field Experiment in Indonesia[J].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10(2) : 243-67.
- [20] GERBER A S. et al.Social Pressure and Voter Turnout: Evidence from a Large-Scale Field Experiment[J].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08(1) : 33-48.
- [21] RUNES D D.Dictionary of Philosophy.Patterson ,NJ: Littlefield ,Adams & Co. ,1962.
- [22] HINKELMANN K. ,KEMPTHORNE O.Design and Analysis of Experiments ,Volume1 [M].2nd edition.Wiley 2008.
- [23] WALDNER D.Transforming Inferences into Explanations: Lessons from the Study of Mass Extinctions[G].In LEBOW R N. and LICHBACH M I.(eds) .Theory and Evidence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 [24] COCHRAN W.G. & CHAMBERS S P.The Planning of Observational Studies of Human Populations[J].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Series A (General) ,1965(2) : 234-266.
- [25] HECKMAN J J. et al.The economics and econometrics of active labor market programs[G].Handbook of labor economics , 1999(3) : 1865-2097.
- [26] NEYMAN J.On the Application of Probability Theory to Agricultural Experiments: Essay on Principles [J].Statistical Science , 1923(5) : 465-80.
- [27] RUBIN D B.Estimating Causal Effects of Treatments in Randomized and Nonrandomized Studies[J].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1974(1) : 688-701.
- [28] GERRING J.The Mechanismic Worldview: Thinking Inside the Box [J].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008(1) : 161-179.
- [29] HEDSTROM P ,YLIKOSKI P.Causal Mechanisms in the Social Sciences[J].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010(1) : 49-67;
- [30] FALLETTI T G. & LYNCH J F.Context and Causal Mechanisms in Political Analysis[J].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2009 (9) : 1143-1166.
- [31] HECKMAN J.Econometric Causality[J].International Statistical Review , 2008(1) : 1-27.
- [32] ROSENBAUM P R.Choice as an Alternative to Control in Observational Studies[J].Statistical Science ,1999(3) : 259-304.
- [33] GERRING J.Causal Mechanisms: Yes ,But [J].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2010(11) : 1499-1526.

- [34] IMAI K. et al. Unpacking the Black Box of Causality: Learning about Causal Mechanisms from Experimental and Observational Studies [J].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11(4) : 765-789.
- [35] 孟天广, 季程远. 重访数字民主: 互联网介入与网络政治参与——基于列举实验的发现 [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4) : 43-54.
- [36] 刘小青. 降低评价尺度偏差: 一项政治效能感测量的实验 [J]. 甘肃行政学院学报 2012(3) : 47-54.
- [37] CHEN J. et al. Sources of Authoritarian Responsiveness: A Field Experiment in China [J].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016(2) : 383-400.
- [38] Meng T. et al. Conditional Receptivity to Citizen Participation Evidence From a Survey Experiment in China [J].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2017(4) : 399-433.
- [39] HE B. From Village Election to Village Deliberation in Rural China: Case Study of a Deliberative Democracy Experiment [J].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2014(2) : 133-150.
- [40] DERLETH J. KOLDYK D R. The Shequ Experiment: Grassroots Political Reform in Urban China [J].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004(41) : 747-777.
- [41] BERNAUER T, GAMPFER R, MENG T et al. Could More Civil Society Involvement Increase Public Support for Climate Policy-making? Evidence from a Survey Experiment in China [J].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2016(40) : 1-12.
- [42] KERTZER J D, MCGRAW K M. Folk Realism: Testing the Microfoundations of Realism in Ordinary Citizens [J].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2012(2) : 245-258.
- [43] CHARNEY E. & ENGLISH W. Genopolitics and the Science of Genetics [J].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13(2) : 382-395.
- [44] 徐湘林. 从政治发展理论到政策过程理论——中国政治改革研究的中层理论建构探讨 [J]. 中国社会科学 2004(3) : 108-120.
- [45] 卢凌宇. 政治学田野调查方法 [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4(1) : 26-47.
- [46] Sebastian Heilmann. 中国异乎常规的政策制定过程: 不确定情况下反复试验 [J]. 开放时代 2009(7) : 43-50.
- [47] KING G, PAN J. & ROBERTS M E. Reverse Engineering Chinese Censorship: Randomized Experimentation and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J]. Science 2014(6199) : 1-10.
- [48] BOND R M et al. A 61-million-person Experiment in Social Influence and Political Mobilization [J]. Nature 2012(7415) : 295-298.

责任编辑: 赵 超